

民国时期心理健康研究及其当代价值*

陈庆华¹, 庞维国²

(1. 合肥师范学院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 合肥 230601; 2.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上海 200062)

摘要:我国心理健康研究发轫于民国时期,是在引介西方儿童心理学、心理测验及心理卫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我国本土问题研究而逐渐兴起的;根据研究侧重点的变化,可分为引介国外研究、注重本土研究、服务普通大众三个发展阶段。民国时期的心理健康研究主要集中在儿童心理健康、心理健康测评、精神分析探讨与应用三个方面。民国时期的心理健康研究具有鲜明的科学性、本土性与应用性特征。民国时期心理健康研究中体现出的爱国主义情怀、服务人民福祉以及扎根中国大地的精神,对于今天开展心理健康研究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民国时期;心理健康;研究阶段;研究内容;研究特征;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8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23)03-0202-08

1 引言

民国肇造,百废待兴。为破除国民思想之积弊,孙中山先生提出“心理建设”方略,并把它置于三大建国方略之首(王静,霍涌泉,宋佩佩等,2019)。是时,西学东渐之风日盛,改造国民心理被视为改造社会的前提(吴南轩,1934),科学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正式创建。这一时期的中国心理学家,一方面以“开启民智”为使命,在借鉴西方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力发展心理学学科;另一方面也注意到“变乱纷乘”给民众心理健康造成的严重影响,希冀通过“心理卫生”建设提升国民素质。由此,心理健康研究应时而生,并成为我国科学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国时期的心理健康研究尽管深受西方儿童心理学、心理测验、心理卫生等学科影响(范庭卫,2012),但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所取得的丰硕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今天开展心理健康研究依然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有鉴于此,本文旨在对民国时期我国心理健康研究状况作以梳理,并剖析其当代价值,以期能为相关研究者与实践者带来某些启示。

2 民国时期心理健康研究的发展历程

根据学科是否确立以及研究重心的变化,我们可把民国时期的心理健康研究分为三个基本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引介国外研究期,时间上大致介

于民国成立(1912年)到心理健康学科创立(1930年)之间。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是开始重视心理健康问题,大力引介西方研究成果,但本土化研究较为少见。

1916~1917年,《京师教育报》连续刊载丁伟东译自日本守内喜一郎的文章《优等儿童与劣等儿童之精神卫生》,强调通过对不同学习水平的儿童施以差异化教学,促进儿童的精神卫生;1922年,东南大学率先开设“变态心理学”课程;1926、1927年,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心理学系也相继开设“变态心理学”课程,介绍西方的心理健康研究成果(王东美,桑志芹,2019)。1928年,赵演发表《精神卫生》《精神健康的基础及一般原则》两篇编译文章,阐述了精神卫生的目的、基础、原则及其与教育的关系等(阎书昌,2015, pp. 177-178)。这一时期,研究者非常重视精神分析学说。如1928年,常惠卿在《清华周刊》发表译文《精神分析与心灵卫生》;1929年,华超出版译著《心理学与精神治疗法》。受此影响,民国初期的教育家也日益重视心理健康教育。例如,蔡元培、王国维、陶行知等人都主张身心的和谐发展,强调青少年儿童健全人格的养成(毛春梅,2007;黄书光,1999;张颖,2007)。廖世承、杨贤江等学者还积极倡导在学校训育中贯彻心理健康原则。廖世承强调教师要多与学生个别谈话,“观察学生之性情志气”,增进师生情感;训育主任应备有“与学生个别谈话存查表”,表中宜含有心理测验的内

*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23AH051274)。

通讯作者:陈庆华, E-mail: 873498616@qq.com。

容(肖朗,范庭卫,2010)。杨贤江明确提出,学校训育与整个教育都应关注儿童的心理健康,并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科学指导(肖朗,范庭卫,2010)。

第二阶段为注重本土研究期,时间上大致介于1930年~1936年之间。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是心理健康学科正式建立,本土化的心理健康研究全面展开。

1930年,章颐年在上海暨南大学率先开设《心理卫生》课程,这标志着我国心理健康学科的正式确立。三十年代初期,随着国际心理卫生运动的不断推进,吴南轩、陈宗仁、张耀翔、萧孝嵘等人纷纷撰文探讨心理卫生的理论问题,并在高校开设心理卫生专题讲座。期间,吴南轩领衔在中央大学开展的心理卫生教育颇具影响力。该校不仅先后开设了《心理卫生》《儿童心理卫生问题》《心理卫生原理》等多门课程,而且在其主办的《教育丛刊》《心理半年刊》等杂志刊载了一系列关于心理卫生的文章(王蕴瑾,陈巍,2015)。伴随学科的建立,心理健康研究与实践也在国内全面展开。1935年,章颐年在大夏大学创办问题儿童心理诊所、黄翼在浙江大学创办培育院,开展心理健康的实践研究。1936年,章颐年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心理卫生领域专著《心理卫生概论》,受到学界高度认可(舒跃育,2015)。同年,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于南京正式成立,大大推进了我国的心理健康研究。期间,廖世承、陈鹤琴、陆志韦、萧孝嵘、艾伟等人修订或编制了各类智力测验、人格测验与学科能力测验,利用这些工具开展儿童智力与学习能力培养、人格特质的鉴定与评估、心理咨询与治疗等方面研究。

第三阶段为服务普通大众期,时间上介于1937年~1949年之间。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是把心理健康研究的重心从高校转向社会,重视普通民众的心理健康。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饱受战争疾苦,国民的心理健康受到强烈冲击。是时,心理健康研究者开始系统地关注社会各阶层的心理健康问题。对于学校,研究者一方面主张扩大心理健康教育的范围,例如吴南轩1938年撰文建议,中学增设心理学课程,大学与专科学校可开设心理卫生必修课;另一方面,则强调加强案例研究,面向各级学校提供服务。例如,复旦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等高校成立了心理卫生的师生组织,开展讨论、演讲,

向各年龄段的学生提供心理健康指导(阎书昌,2015,pp. 221-224)。对于社会,研究者则特别关注战时的心理健康问题。例如,丁瓚不仅通过教学、讲演、研究与心理门诊等形式,开展了大量提升战时民众心理健康的工作,而且还针对战时难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开发了周密的考察方案,以便充分了解、及时治疗这些儿童的心理问题,消除未来社会之隐患(郭本禹,2009,pp. 293-302)。期间,很多报刊发表了大量以心理卫生、精神疾病、情绪管理等为主题的文章。如《时事月报》《闽政月刊》《东南评论》先后刊载《望国人保持战时心理健康》《战时的心理卫生》《军士的心理卫生》《抗战期间的心理卫生》等文章,分析战争期间的军官士兵、普通民众、青年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并提出了维护心理健康的相关原则(阎书昌,2015,p. 228)。

3 民国时期心理健康研究的核心内容

民国时期的心理健康研究主题颇为广泛,但就其核心内容来看,主要涉及儿童心理健康、心理健康测评、精神分析研究与应用三个方面。

3.1 儿童心理健康研究

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是民国时期心理学家特别重视的一个研究领域。早在1923年,周尚就在《教育杂志》发表《问题儿童与心理卫生》一文,强调对精神薄弱、逃学、顽劣、迟钝等类型的儿童进行分析,找到其心理疾病的根源,再施以正确的指导(周尚,1923)。随着精神分析学说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相信,成人的心理问题主要源于儿童时期(章颐年,2013,p. 4)。儿童心理健康也日益成为心理健康研究最为主要的内容。

这一时期的心理学家特别注重考察儿童心理问题产生的根源。例如,高觉敷主张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探究问题儿童的行为成因,并进行相应的心理诊治(徐晓伟,2019);丁瓚则强调通过调查、访谈与咨询等多种形式,深入剖析儿童行为问题的发生机制。对于儿童心理问题的根源,许多研究者指出了不良环境的影响。例如章颐年在《问题儿童的心理卫生》一文(1936)中指出:“问题儿童皆因不幸的家庭、学校或社会所造成,惟有明晰原因,改良环境,才是最有效的根本办法。”吴南轩、萧孝嵘、陈鹤琴等学者也指出,不良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环境是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杨鑫辉,赵莉如,2000,pp. 297-301)。对于心理问题的个体成因,高觉敷则指出,学生的问题行为大多是因为动机无法满足,

为此应深入剖析行为的本源,再实施有针对性的训导(陈四光,2015)。

在探究儿童问题产生根源的基础上,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也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干预措施。例如,吴南轩于1933年发表《问题儿童之心理卫生》一文,明确指导问题儿童的十大原则:“问题行为是因果作用的产物;研究儿童问题行为应从他的过去入手;观察儿童的行为不可用成年人的标准;采取冷静和客观的态度;了解问题儿童行为的动机;注意损伤儿童情绪的细微的事故;取长补短的政策;间接控制行为的方法;消极惩罚减至最低限度;预防问题行为的重要性。”萧孝嵘在其《教育心理学》(1944)的“心理卫生”一章,更是提出了教师应注意的十一条原则:对学生不可采取仇视或讽刺的态度;应注意于学生的精力之调节;应注意于良好习惯之养成;应注意于理想之培植;应培植适当的社会精神和团体精神;应注意于危险性之符号;应注意于个别的情形;应辨别各种行为在严重性上之程度;对于每个问题应当求其根本原因;应设法取消学生的卑劣情感;对于学生的秘密事件应当严守秘密。他还提出了学生维持自身心理健康的三原则:适中原则、现实原则与诙谐原则。抗战期间,上海、重庆、成都等地分别成立了上海儿童心理指导所、重庆心理卫生室、成都儿童指导所等专门机构,为战乱中的儿童提供心理健康服务。1948年,汤铭新将成都儿童指导所的工作汇总成《儿童行为指导工作》一书,书中详细介绍了成都儿童指导所的工作经验,并附有丰富的案例资料。成都儿童指导所主要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首先了解儿童的个人病史、家庭环境、社区环境、同伴关系等情况,再酌情开展身体检查、神经精神检查或心理测验,最后讨论诊治方案(胡清,2020)。这对于当时的儿童心理健康工作极具参考价值,也进一步推动了儿童心理健康研究。

民国时期的心理学家还特别重视训育的育心功能,强调学校教育要能够促进儿童的心理健康。例如,黄翼提出“以心理卫生为基础之儿童训导原则为教导儿童之最正当途径”,他反对学校对于犯错误的学生一味地训斥与惩罚,强调训育工作要遵循儿童的心理发展规律,且对于问题学生要开展科学的心理辅导(范庭卫,2009)。章颐年认为,训育的目的在于积极改造儿童的行为,如对于行为不良的学生予以除名,将极大地影响儿童心理健康发展(卓学仁,陈巍,2015)。在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方面,

廖世承、杨贤江等还提出了全员、全方位、全过程的理念。廖世承特别强调,“训育不是由少数专职人员负责,而是由全体教员和学生共同负责”“学校内任何设施,有教育意义的,都和训育有关”;杨贤江则提出,学校训育及整个教育都要贯彻“全人生指导”的理念,要担当起学生学习、人际交往、爱情、择业、闲暇等方面的指导责任(肖朗,范庭卫,2010)。这些训育思想,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全员、全程、全方位”心理健康教育理念是高度一致的。

3.2 心理健康测评研究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伴随国际心理测验运动的发展,我国的智力测验、人格测验、心理问题评估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且被广泛运用于诸多领域。当时的社会工作者吴桢认为,“社会工作者要与心理学者密切合作,将智力测验、心理测验、特殊才能测验等用于医疗社会工作、青少年犯罪、儿童行为问题等方面(王春霞,2016)。”

1920年,廖世承与陈鹤琴在南京高等师范开设了测验课程,并以心理测验试验学生,开启了我国科学心理测验之先河(赵莉如,1990);1921年,两人还合编出版了我国最早的智力测验专著《智力测验法》一书。考虑到我国各地方言的较大差异以及当时的高文盲率,刘湛恩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以美国的非语言智力测验为参考,编制了我国最早的本土化非语言智力测验。1922年,他在桑代克的指导下,完成其博士论文《非言语智力测验在中国的运用》(王勇,钱燕燕,陈巍,2017)。这些智力测验可“辨别智愚,甄别班次,分别才能,估量成绩,改进教法,鼓励学业,诊断优劣,预测将来(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1985,p.441)”,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除了智力测验,研究者还系统开发了用于评估个性的测评工具。例如,萧孝嵘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先后修订了普雷西XO测验、古氏画人测验、马士通人格评定量表、莱氏品质评定量表等人格测验,并进行推广与应用(李秋生,王小文,2017)。1931年,中国测验学会在南京成立;次年,学会主办的《测验》杂志创刊,心理健康测评研究得以进一步推动(张厚粲,余嘉元,2012)。是时,心理健康的标准问题也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1936年,章颐年在其专著《心理卫生概论》中提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健康标准,包括:(1)像别人,即个体的心理与行为与大多数人相似;(2)与年龄相符,即个体的身心发展符合其年龄特征;(3)能适应他人,即具有正常

的社会交往能力;(4)快乐,具有较多的积极情感体验;(5)统一的行为,即行为是一致的、完整的;(6)适度的反应;(7)把握现实,能主动面对而不是逃避现实;(8)尊重他人的意见(章颐年,2013, pp. 25 - 37)。抗战期间,用于评估心理健康的工具继续得到发展。丁瓚编制《自我心理检讨》大纲,并指导中央卫生实验院心理卫生室编制了《儿童行为指导咨询表》,萧孝嵘修订《萧氏订正个人事实表格第一种》《萧氏订正个人事实表格第二种》等,这些工具均可适用于心理健康问题的调查与研究(范庭卫,2014)。当时的美国心理学家麦柯尔认为,我国编制的心理测验足以与美国的水平相当,甚至有些比美国更优(漆书青,1994)。

周先庚指出,“研究指导情感生活适应不良的人,能够做点贡献,这是心理学家的责任(严慧中,陈巍,2014)。”而心理健康测验则是研究者帮助国人解决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依据。1932年,周先庚等人采用瑟斯顿的“烦恼调查单”调查了约600名大、中学生,结果表明:中国大学生中情感障碍者远多于美国大学生。他指出,一些中国学生虽有心理疾患但却无处医治,学校有必要开展学生的心理健康调查并予以存档(严慧中,陈巍,2014)。抗战期间,钱莘等人采用团体测验与个别谈话相结合,发现从沦陷区抢救出来的难童们大多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根据调查结果,心理专家们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心理咨询与治疗方案,特别强调应帮助难童改进人际关系,培养难童间团结互助的精神,尽可能与难童的家人、亲友取得联络,且要提高保育人员的素质(苏华,1995)。

3.3 精神分析研究与应用

民国时期,精神分析学派在国际上具有很大的影响,我国心理学界也对此一直保持高度关注。相关的研究者不仅开展了大量关于精神分析的理论研究,而且还特别注重该理论在心理健康实践中的应用。

对于精神分析的理论研究,高觉敷先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25年,他翻译了弗洛伊德在美国克拉克大学五次演讲内容的《精神分析五讲》,并译成《心之分析的起源及发展》发表在《教育杂志》上(张晓旭,2010)。之后,他又发表多篇文章评介精神分析理论,并于三十年代翻译了弗洛伊德的两部重要著作《精神分析引论》《精神分析引论新编》,为国人全面认识精神分析发挥了关键作用(高觉敷,2005,

p. 401)。高觉敷认为,精神分析理论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过分夸大潜意识的意义;泛性论违反了唯物论的历史观,抹煞了社会文化和社会历史条件的重要性;弗洛伊德提出的死亡本能概念否定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张晓旭,2010)。

1932年,戴秉衡师从新精神分析学派代表人物沙利文,继承了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学派思想。他不认同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及驱力理论等观点,而强调文化模式与人格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当下”应更受关注。以这些思想为指导,1936~1939年他在北平协和医学院神经精神科开展门诊、培训与研究工作(郭本禹,阎书昌,2020)。同一时期,丁瓚也较为深入地研究了精神分析。他先后发表《心理分析的新途径》《弗洛伊德理论的限度》等多篇文章,对精神分析理论做出了客观评价。他一方面指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心理分析是科学地认识人类心理的最重要工具,另一方面也指出,精神分析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忽略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沈佩琦,2018)。

在民国时期青少年心理问题矫治的个案研究中,精神分析取向成为重要的理论基础。高觉敷在《治疗教育》(1940)一文中指出,要用精神分析的方法诊治具有反社会倾向的青少年儿童。他依据精神分析理论,提出“易欲望为动机”的思想,主张通过观察,并与儿童及其亲友谈话,追溯幼时经验,探寻问题行为的深层原因(徐晓伟,2019)。中华慈幼协会负责人李卓依总结其多年的临床案例,在《现代父母》发表多篇《儿童个案纪》,介绍问题儿童的诊治情况。在她的诊治方案中,“自由联想”是探究病源与治疗病症的重要方法(胡清,2020)。萧孝嵘指导研究生钱莘用精神分析方法进行抑郁症儿童研究,并发表了研究报告《抑郁儿童之个案研究》(1935)(肖朗,范庭卫,2010)。1937~1948年,丁瓚先后在北平、重庆、南京开展心理治疗工作,并把精神分析运用于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个案资料。在钱莘与丁瓚发表的个案报告中,他们分别运用梦的解析,了解儿童潜意识中的压抑与创伤,使儿童充分倾诉其内心的困扰,予以有效矫治。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丁瓚还多次引用精神分析理论,在《西风》《大公报》等报刊回复读者的来信咨询,帮助民众维护自身的心理健康。

4 民国时期心理健康研究的主要特征

民国时期的心理学家大多抱着科学救国的信念

负笈海外,学成回国之后,他们一方面致力于西方科学心理学的传播,另一方面希冀借助心理科学解决本土问题(Blowers, Cheung, & Ru, 2009)。这种时代精神,决定了民国时期的心理健康研究具有鲜明的科学性、本土性与应用性特征。

4.1 坚持科学标准,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民国时期的心理学家大都受过科学心理学的训练,他们非常重视按照科学标准开展心理学研究(王东美, 桑志芹, 2019),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汪敬熙指出:“只有由实际做问题的研究才能体会到科学方法的精神和意义,才能真正学会运用科学方法而不是仅会把这种思想方法在嘴边讲来讲去(郭本禹, 2009, p. 184)。”在心理健康研究方面,他们不仅重视理论研究,更注重从实践中获取丰富的实证材料。例如,为了更具针对性地改良儿童的德育问题,陈大齐编制了儿童道德意识调查表,并于1918 年在北京、浙江、江苏、江西、直隶、山西等地展开调查(郭本禹, 2009, pp. 6-7)。为了检测学生的智力问题,1922 年春,廖世承、陈鹤琴采用比纳-西蒙智力测验,在京沪一带学校对 1400 余名学生进行施测;1923 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地区组织开展普通的智力与教育测验,施测总人数超过 10 万人(赵莉如, 1990)。1939 年,艾伟在中央大学开办学习心理实验班,主要研究初中国文、数学、英语三科的学习问题。例如,对于初中生文言文诵读问题,艾伟从“篇幅长短与诵读速率”“文章内容在背诵与默读上的影响”等不同角度开展实验,探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学生学习效率的有效方法,并给予学习困难学生及时干预(李陈哲, 2018)。1944 年,艾伟等人还采用自行编制的《小学国语阅读诊断测验》,在 15 所小学调查了四、五、六年级的 1112 名小学生,研究阅读心理领域的深层个别差异,以及时发现与补救儿童阅读能力的不足(崔丽莹, 1999)。

4.2 聚焦本土问题,强调心理健康研究的中国化

民国时期心理学家深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特别强调本土问题的解决。张耀翔提倡“外国学问中国化”,潘菽认为学术研究应结合本国国情且适应实际需要,丁瓚则明确提出“心理卫生中国化”的思想。相应地,这一时期的心理健康研究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主要表现为:其一,以西方的心理学理论为框架,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健康思想。例如,近代佛教大师太虚在

其《佛学与心理卫生》(1938)一文,用佛教的观点来阐述心理疾病的根源与应对措施:“痴、执、贪、慢、嗔、疑为六根本烦恼,而忿、恨等二十为随烦恼,其预防治疗及培养增进其健康,则仍不外发起并扩充信、惭、愧、精进等十一种善心”。张耀翔发表了《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1940)一文,系统梳理了老子、庄子、孟子、荀子、管子、韩非等古代先贤的心理学思想,并在古代心理健康与心理测验等方面做了较为深入的探究(汪凤炎, 2008, pp. 645-647)。张瑞璠发表《老子的心理卫生》(1946)一文,认为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即有心理健康的主张。胡忠智发表《中国固有之心理卫生学》(1949)一文,较为深入地剖析了孔子的心理健康思想(阎书昌, 2015, 第 246 页)。其二,在借鉴西方心理健康理论和测评技术的基础上,发展本土化的理论和工具。例如,戴秉衡注重从社会文化背景理解人格问题(Blowers, 2004),他结合在北平协和医学院收集的资料,发表了《中国文化中的人格问题》(1941)一文,就中国患者所面对的经济与工作、家庭、学业、社会、婚外情等社会问题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郭本禹, 阎书昌, 2020)。此外,廖世承、陆志韦、萧孝嵘、丁瓚等心理学家也在借鉴西方心理健康测评研究的基础上,修订或自行编制适合我国国情的多种智力测验、人格测验以及心理与行为问题评估工具。

4.3 注重服务社会,凸显心理健康研究的应用性

民国时期的心理健康研究者,深受中山先生“心理建设”思想的影响,他们特别强调研究的应用性。这一时期的心理健康服务已呈现出全方位、多样化特征。首先,在服务的内容上,涉及到儿童的行为问题、学习问题、心理障碍、职场心理卫生、战时心理调节等多个方面。例如,章颐年在大夏大学创立的问题儿童心理诊察所,为顽皮、愚笨、偷窃等各类问题儿童进行诊断,并结合临床案例,为儿童教育提出对策与建议(舒跃育, 2015)。曹仞千发表了《一个小学教师应有的心理卫生常识》(1937)一文,引导教师预防与应对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萧孝嵘组织中央大学的心理学者开展人事心理学研究,探讨改善不同行业人员的心理健康问题。抗战时期,丁瓚在中央卫生实验院心理卫生室开展了大量咨询工作,为战时民众提供心理健康服务。其次,在服务的形式上,做到了丰富多样。这包括:一是开展心理健康科普宣传。是时,《西风》《青年生活》《现代父母》《教育杂志》等报刊杂志发表了大量文章,普及

心理健康问题。江苏省教育厅主办的《小学教师》半月刊,更是于1937年第4卷第17期推出“儿童心理卫生”专号,系统介绍了“儿童心理卫生的原则”“学校与家庭儿童的心理卫生”“儿童心理的缺陷与治疗”等多方面的知识。中央卫生实验院还定期进行心理卫生讲座,“用国内的个案材料来扩大心理卫生的宣传”(丁瓚,1945, pp. 1-8)。二是开展专门的心理咨询与治疗。例如,除了章颐年1935年设立的问题儿童诊察所外,上海中华慈幼协会于1936年设立了儿童心理诊察所,开展儿童心理治疗工作(杨鑫辉,赵莉如,2000, p. 192)。1942年,丁瓚在中央卫生实验院设立心理卫生咨询处与心理卫生门诊;为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还专门设立了“儿童行为指导会”“儿童行为指导门诊”(范庭卫,2014)。三是对心理健康工作者进行培训。例如,1941年,丁瓚邀请社会工作者吴桢到中央卫生实验院工作,培训从事心理健康工作相关的社会工作人员(范庭卫,黄剑,2010)。

5 民国时期心理健康研究的当代价值

回望民国时期我国心理健康研究的发展历程、研究内容及主要特征,可以看出,如下三个方面对于我们今天开展心理健康研究仍具有极为重要的时代价值。

5.1 爱国主义情怀是心理健康研究的不竭动力

民国时期的心理学家大都本着救国救民的理想而开启了中国心理健康研究与实践。他们既是学贯中西的心理学家,更是满腔热忱的爱国志士。他们坚信“民心健全者国必强盛,民心堕落者国必衰微(卓学仁,陈巍,2015)”,坚信心理建设是民族复兴的基本条件,国民心理健康是心理建设的必要前提(吴南轩,1934);他们把民族复兴作为自己的学术使命,把“心之为用”作为自己报效国家的基本途径。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他们在社会动荡中坚持研究,在战火纷扰中服务民众。今天,虽然我们生活在社会和谐、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幸福环境中,但是加强心理健康研究、促进国民心理健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依然是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我们应该像民国时期的心理学前辈一样,将爱国情怀融入到心理健康研究与实践探索中,勇于担当、无私奉献、开拓创新,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健康中国建设之中。

5.2 增进人民福祉是心理健康研究的基本使命

民国时期的心理健康研究具有鲜明的应用性特

征。是时,尽管心理健康研究者亦重视学科建设,但他们更为关注的是面向社会需求,解决民众问题,增进人民福祉。他们将“心理卫生”视为“与‘革心’及‘心理建设’同一涵义的东西”(吴南轩,1938),“以保护与促进国民之精神健康及防止国民之心理失常与疾病为唯一之目的(张乔龄,陈巍,2017)”。正是这种服务民众的自觉意识与责任担当,赢得了社会的广泛支持,从而使得当时的研究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始终充满着旺盛的活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这实际上是要求充分发挥心理学的应用价值,面向全体国民服务,提升人民群众的心理健康水平,促进和谐社会发展(葛明贵,高函青,2020)。为此,新时代的心理健康研究者更应以民国时期的心理学家为榜样,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面向民众,更加切实地开展好社会心理服务工作。

5.3 扎根中国大地是心理健康研究的根本出路

民国时期的心理健康研究尽管是以引介西方的研究成果为发端的,但其基本思路是在吸纳西方先进理论、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实现“外国学问中国化”,这一民国时期的心理健康研究并非与西方一样“为了科学而科学”,而是牢牢地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土壤,着力解决本国国民的心理健康问题,以求实现“启蒙”“救亡”“强国”的时代使命(王东美,桑志芹,2019)。民国时期的心理学家崇尚西方的科学精神,同样也重视在心理健康研究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们既重视学习西方的心理健康理论,也重视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健康思想。在他们身上既显现出文化自觉的主体意识,又显示出了文化自信的精神力量。可以说,博采中西之长,凸显中国特色,扎根中国大地,解决本土问题,是民国时期心理健康研究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今天,中国的心理健康研究与民国时期尽管不可同日而语,但本土化的国民心理健康问题依然普遍存在。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今日之心理健康研究者应进一步继承民国先辈的宝贵精神财富,一方面探究有效方法,切实解决民众的各种心理健康问题,另一方面注重发展中国特色的理论和技术,为世界心理健康研究做出中国化的贡献。

参考文献

-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1985).陈鹤琴教育文集(下卷).北京:北京出版社.

- 陈四光. (2015). 民国时期心理卫生与心理训导中的“心理健康教育”. 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专题资料汇编: 当代教育评论(第2辑).
- 崔丽莹. (1999). 艾伟的阅读心理研究. 心理科学, 22(4), 335-338+317.
- 丁瓚. (1945). 心理卫生论丛. 重庆: 商务印书馆.
- 范庭卫. (2009). 黄翼与中国儿童心理辅导的开拓. 心理学报, 41(2), 182-188.
- 范庭卫. (2012). 民国时期心理健康研究述论. 第十五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论文摘要集. 广州: 第十五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
- 范庭卫. (2014). 丁瓚与抗战时期的心理健康教育. 海峡教育研究, (1), 73-77.
- 范庭卫, 黄剑. (2010). 丁瓚与心理分析的应用. 中华医史杂志, 40(5), 306-310.
- 高觉敷. (2005). 中国心理学史(第2版).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 葛明贵, 高函青. (2020). 中国特色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 路径分析. 心理科学, 43(1), 200-205.
- 郭本禹. (2009). 中国心理学经典人物及其研究.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 郭本禹, 阎书昌. (2020). 民国时期心理学的源与流及其历史遗产.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8(4), 104-116.
- 胡清. (2020). 民国时期的儿童指导理论与实践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苏州大学.
- 黄书光. (1999). 试论王国维的教育哲学观.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 68-76.
- 李陈哲. (2018). 教育科学化求索的一个样本——艾伟教育心理学理论及其在教育上的应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
- 李秋生, 王小文. (2017). 中国心理学界华东师大五虎将(一)——萧孝嵘. 大众心理学, (3), 47-48.
- 毛春梅. (2007). 蔡元培心理健康教育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扬州大学.
- 漆书青. (1994). 解放前我国的心理测量研究.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 93-98.
- 沈佩琦. (2018). 心理治疗师的专业成长——以丁瓚(1910-1968)为例(硕士学位论文). 苏州大学.
- 舒跃育. (2015). 章颐年: 中国心理卫生运动的开拓者. 自然辩证法通讯, 37(6), 138-146.
- 苏华. (1995). 抗战时期难童的异常心理问题. 民国档案, (3), 121-129.
- 太虚. (1938). 佛教春秋: 佛学之心理卫生. 海潮音, 19(12), 603-605.
- 王春霞. (2016). 民国时期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研究——以北平、成都、南京三地的实践为中心. 社会工作与管理, 16(1), 33-38.
- 王东美, 桑志芹. (2019). 现代心理治疗在中国的开端——兼论心理治疗中国化问题.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3), 58-69.
- 王静, 霍涌泉, 宋佩佩, 等. (2019). 孙中山的心理建设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心理学报, 51(11), 1281-1290.
- 王儒珍, 曹仞千, 等. (1937). 儿童心理卫生专号. 小学教师(半月刊), 4(17).
- 王勇, 钱燕燕, 陈巍. (2017). 刘湛恩的心理测量学思想及其实践初探. 心理技术与应用, 5(12), 756-761.
- 王蕴瑾, 陈巍. (2015). 破的由来事 先锋孰敢争——中国心理卫生运动的领路人吴南轩. 心理技术与应用, (1), 60-64.
- 汪凤炎. (2008). 中国心理学思想史.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吴南轩. (1934). 国际心理卫生运动. 国立中央大学教育丛刊, (1), 1-39.
- 吴南轩. (1938). 中国心理卫生运动之回顾与前瞻. 教育通讯(汉口), (36), 12-14.
- 肖朗, 范庭卫. (2010). 民国时期心理卫生的理念和思想对教育学术的影响. 社会科学战线, (11), 178-186.
- 萧孝嵘. (2009). 教育心理学(下册, 1944年商务印书馆版重印本).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 严慧中, 陈巍. (2014). 周先庚: 才华横溢的中国现代心理技术学先驱. 心理技术与应用, (3), 62-64.
- 阎书昌. (2015). 中国近代心理学史(1872-1949).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杨鑫辉, 赵莉如. (2000). 心理学通史(第二卷): 中国近现代心理学思想史.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 徐晓伟. (2019). 高觉敷心理健康教育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苏州大学.
- 张厚粲, 余嘉元. (2012). 中国的心理测量发展史. 心理科学, 35(3), 514-521.
- 张乔龄, 陈巍. (2017). 中国现代心理卫生运动的急先锋: 吴南轩. 大众心理学, (10), 47-48.
- 章颐年. (1936). 问题儿童的心理卫生. 心理季刊, (3), 43-49.
- 章颐年. (2013). 心理卫生概论(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重印本). 北京: 东方出版社.
- 张颖. (2007). 陶行知心理健康教育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扬州大学.
- 张晓旭. (2010). 高觉敷心理学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南京师范大学.
- 赵莉如. (1990).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中国测验学会和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心理学动态(专集)——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
- 周尚. (1923). 问题儿童与心理卫生. 教育杂志, (9), 22.
- 卓学仁, 陈巍. (2015). 无人信高洁 谁为表予心——“失落”的中国现代心理学家章颐年. 心理技术与应用, (4), 57-62.

Blowers, G. (2004). Bingham Dai, Adolf Storfer, and the tentative beginnings of psychoanalytic culture in China: 1935 – 1941.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1), 93 – 105.

Blowers, G., Cheung, B. T., & Ru, H. (2009). Emulation vs. in-

digenization in the reception of western psychology in Republican China: An analysis of the content of Chinese psychology journals (1922 – 1937).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1), 21 – 33.

Mental Health Research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Chen Qinghua¹, Pang Weiguo²

(1.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Hefei Normal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2. School of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mental health in China originated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was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western child psychology, psychological tests and mental health, and 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local problems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change of emphasized point,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development stages: introducing foreign research, focusing on local research and serving the general public. The study of mental health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mainly focused on three aspects: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mental health evaluation,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psychoanalysis. The research on mental health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scientificity, locality and applicabilit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spirit of patriotism, serving the people's well-being and taking root in the Chinese land reflected in the study of mental health, which is still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 of mental health today.

Key words: the Republic of China; mental health; research stage; research content;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contemporary value